

毛澤東與國慶節

馬佳

在喜慶共和國六十華誕之際，不禁想起開國領袖毛澤東的國慶往事。
「溫故而知新」，對於今天的人們不無意義。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國歷史翻開嶄新一頁。這天下午三時，毛澤東與中央人民政府全體委員由天安門西側拾級而上，登上城樓。廣場上三十萬群眾沸騰了，迎風招展的紅旗匯成海洋。毛澤東走到麥克風前，用洪亮的湖南鄉音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觀看閱兵式和群眾遊行時，毛的表情卻時而輕鬆時而凝重，他自己披露是「又愉快又不愉快」，事後他這樣解釋：「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但總覺得中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後，很窮，一窮二白……」一代偉人的高瞻遠矚和愛國情懷由此可見！當新組建的人民空軍十七架「戰鷹」飛過天安門上空時，廣場上響起海嘯般的歡呼聲，此時毛的臉上才展露笑靨。

這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足足站了六個小時，沒有片刻休息，直到晚上九時半遊行結束才回到中南海。這天毛對身邊人講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勝利來之不易！」

一九五〇年國慶日，天安門廣場舉行第二次閱兵，部隊的武器裝備尚未更新，毛澤東的心情也不輕鬆。當時國內外形勢嚴峻：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佬的炮火眼看要燒到鴨綠江邊上，國慶前夕毛澤東收到金日成發來的緊急求援信；國內殘餘反動勢力正在蠢蠢欲動，北京市公安局剛剛破獲了一起敵特企圖炮轟天安門的大案，並查獲一門迫擊炮。上天安門前，毛澤東不無諷刺地對人們說：「如果真要遇到打炮，誰也不許跑。」當晚毛澤東回到中南海就立即召開高層軍事會議，最終作出決策：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一九五四年，我國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時期，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舉行。十月一日上午十時隆重舉行國慶五周年慶典，毛澤東在城樓上檢閱五年來發展壯大的各兵種受閱部隊，他的身旁是金日成與赫魯曉夫。毛澤東難抑內心的感慨，微笑着向歡慶的人群頻頻招手致意。昂首仰望藍天上飛過的銀白色「雄鷹」，六十二歲的毛澤東笑容更燦爛了。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共和國十歲華誕。中共中央邀請蘇聯等十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和日本、印度等六十個國家共產黨代表團參加國慶慶典，這次閱兵規模超過此前任何一次。與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並排而立的毛澤東雖然偶有笑容，但比較勉強，不容樂觀的國內形勢與變化多端的國際局勢令他心有志志。赫魯曉夫又告訴毛澤東一件壞消息：準備撤回在華專家，並不再提供核技術幫助了。毛澤東淡淡一笑說「那也好」，隨後走到越南主席胡志明身旁。也就在這一時刻，毛澤東下定決心：中國要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彈。

一九六五年國慶節，毛澤東的心情比較舒暢，三年自然災害的陰影終於消解，這年五月，七十二歲的毛澤東回到闊別三十六年的井岡山，戰爭歲月的記憶令他思緒萬千。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滿面笑容，還與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談笑風生。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文革」中的北京照例舉行盛大國慶慶典。這一天在天安門上與毛澤東並肩而立的是美國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他倆的合影成為經典。延安時期曾經採訪過毛澤東的斯諾感到毛明顯老了許多，毛澤東則將斯諾介紹給「林副主席」。事後斯諾回憶起這一幕時說，毛澤東是想通過這一方式向美國總統傳遞這樣一個信息：中美關係應該解凍了。果然，一年半後尼克松訪華，不久中美正式建交。

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出席多次國慶盛典，人們看到的都是他笑容可掬的形象，其實他心境並不總是那麼愉快，他時刻都在憂慮新中國的內外處境與前途命運，與人民大眾休戚與共的魚水深情，盡寫在他的眉宇間。

轉眼間到了一九七五年，這一年毛澤東八十二歲了。國慶節當天，老人家靠在床頭，一改過去不釋卷的習慣，靜靜地靠在那裡，似乎很平靜又很疲憊，他肯定知道今天是個什麼日子，但歲月不饒人，數十年來的伏案思考、寫作和鬥爭，令他身心俱疲、沉疴在身。九月三十日晚，由周恩來簽名的國慶二十六周年招待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但周總理因重病未能出席，現在，元氣大傷的毛澤東也蒼老了，正如他的詩句所說：「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緬懷安妮

陳安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是座水城，向來有「北方威尼斯」之稱。除了有兩條河在此交匯外，還有一個密如蛛網的運河系統與荷蘭其他地區以及萊茵河相接。我們在阿姆斯特丹那天，一早就趕去運河乘小遊艇觀賞兩岸景色。在某處，我看到一座樓房前長長的隊伍，其中很多是年輕人，卻不知這究竟是什麼地方，這麼早就吸引那麼多人。也許是一個熱鬧的娛樂場所吧，我想。
那天下午，我們決定去參觀「安妮·弗蘭克之家」。一到那兒，才知我早上看到的隊伍就是排在這兒的。據說，自一九六〇年開放以來，安妮之家每年都有數百個荷蘭的、德國的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學生參觀團前來參觀，所以我在運河遊艇上看到了隊伍裡有很多年輕人。顯然，老一代人，不論是荷

蘭的還是德國的和其他國家的，都希望年輕一代不要忘記安妮，不要忘記她與家人曾匿藏在這裡，寫下了著名的《安妮日記》，寫下了法西斯恐怖統治在一個十三、四歲女孩子心靈上投下的濃重陰影，寫下了一個猶太少女對納粹罪行的憤怒控訴。
我們隨著安靜的參觀隊伍走進了安妮之家，見隊伍中不僅有學生，而且還有老人、婦人、小兒。經過安妮父親曾用來作公司辦公室的主樓，我們進入安妮一家及其好友共八人躲藏的後樓裡的幾間「密室」。有個書櫥把通向底層密室的入口掩藏起來。所有密室的窗戶都被窗簾遮掩著，室內很昏暗。從一間密室到另一間密室，要爬陡直的樓梯。安妮在自己房間的牆上貼了很多圖片。玻璃展覽櫃裡陳放着安妮日記的荷蘭文原稿。
各間密室牆上現都有她的日記摘抄。我背下了其中一則的英語譯文：「我渴望騎自行車，跳舞，吹口哨，看看這世界，感到自己還年輕，知道我是自由的。」在那些暗無天日的歲月裡，她們不能出門，不能大聲說話，廁所要盡量少用，晚上不能點燈。安妮覺得自己快老了，嚮往著能騎車、跳舞、吹口哨的自由生活，把自己的一絲一毫感受都寫進了日記。幸虧有他父親的幾名傭員給他們偷偷送食物和書報，他們才得以在這種裡生存了兩年多。可最後卻還是被人告密，被納粹抓進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們八人中有的死於毒氣室，安妮母親病死，安妮自己及其姐姐傷重而死。安妮父親奧托·弗蘭克則逃過劫，設法出版了女兒的日記《安妮日記》。自一九四七年問世後，已被譯成六十五種文字。
一九四五年安妮死時才十五歲，若能活到今天，也才八十歲。一個年輕的生命早早地消失了，但她的日記使她永生，令世人永遠緬懷她。而那個至今未被查出的告密者，即使能活到今天，也一定是一個始終生活在無窮恐懼和恥辱之中的卑怯可憐蟲。

想起《北大十教授》

徐城北
「新民主主義」是文章還是書？《北大十教授》是一年前，上海《新民晚報》副刊部主任，關係我妻子寫的。她當時在民盟中央的《群言》雜誌當編輯，因工作關係與北大的教授們有些來往。知道了這背景，主任問：你提筆就能寫的，應該有幾個了？妻子屈指數道：有五六位吧。主任說：補充採訪一下，短文字我們《十日談》連載吧。
終於，這十篇一千二百字的短文發了出來。這十位教授分別是：吳組湘、季羨林、李鎮西、金克木、聞家驊、鄧廣銘、張岱年、陳岱孫、侯仁之、馮友蘭。您熟悉其中哪幾位？他們是教什麼學問的大學者？您知道他們哪些小故事？關於他們的排名，誰先誰後有什麼考慮？其中把馮友蘭放在最後，難道僅僅是因為他的年紀最大？他們目前有何處世？只剩下位侯仁之，他住進北大的校醫院也超過半年了……
當年妻子採訪，我陪過幾次，因為有幾位與我父母很熟。我當時正熱衷研究京戲，對高校長物興趣不大，但我有一種特殊感覺：十教授又可以組成一個特殊的長廊，裡邊生且淨且重唱念做打，與梨園風氣又不同。他們可以與你談學問，也可以說些家長里短，但讓你感到這通篇是一部大寫的書，是一種絲毫毫不輸於戲的大學問。北大的十教授，這應該說是一個很典型又很難得的教授群。陣容整齊，卻又分門別派。事實上，北大在其不同的歷史時期，這樣的教授群並不少見。研究其成因，又不能不探討蔡元培校長治校方針。蔡元培只活了一輩子，但他的教育方針卻影響了幾代人。今天大學教育縱有千百種成績，唯獨讓其拿出一個實力均衡的十教授名單，恐怕會感到很難。
還不能不注意到季羨林在上一屆十教授中排名「老二」。在那時的大名單中，顯然是沒有王將或盟主的，但季羨林毫不介意，反正自己的桌燈在沒有開過，最早，反正住住房開關的「季羨林圖書館」不是徒有虛名，反正自己堅持並延續的是老山東人的特性；此時他還沒有花費時間與精力去寫純文學的散文，也還沒有對人類文化問題做出過精彩的預測。總之，此時的季羨林更像七十歲前的種種。季先生對我是有偏愛的，接受過我的請教，合適的，還給我的書寫過序。但十教授最後的季先生是在孤軍奮鬥，我總覺得最後的季先生是那樣的日子。他心中有寂寞與淒涼，他只能不停地寫。
還有一點，妻子寫《北大十教授》時，被訪者多超過了八十歲。大部分人不教課了，都在做個人或學問的文化梳理；當時北大領導層很少干預諸老，諸老也由衷高興：讓我們自由就好！他們年輕時是很抓緊的，不抓緊出不了成績；此際進入了晚年，他們則願活得更隨意些，能夠在池塘邊上漫步，坐在長椅上想點什麼，就已經很愜意了。那時的朗潤園，只有池中的幾聲風荷，還沒有今天的高樓風起。那時是適合做學問的呀，那時也更安靜與舒適呀，但此語剛出口又急忙囑咐不要寫進文章……今日大學有超過當年的千百種實績，但很難再拿出一份這樣的大名單。事實證明，文化上要尊老，老人與老的文化還都是有用的。
時光在回憶中流逝。我們夫婦原來來的十之五六，寫完了文章，依然並繼續熟悉的，還是那十之五六。北大校園中的朗潤園與燕南園在內的幾個局部，其中涉及到十教授的風景與人文，都深深烙印進我們的腦海，他們就如我的父執，能夠不時入夢，有意或無心引導我繼續前行。我也有夢醒之時，閉眼一然他們的呼喚，大多灰灰塵塵，很難難進當世，向學界大聲的疾呼。然而，十教授還是十教授，儘管他們也會年輕過，但總不像後來來學界對他們高聲仰視並遠遠隔離着的那樣。
「如果我們當初對前輩，也總像你們今天對待我們一樣——高聲仰視又遠遠隔離，哪樣還能成就出今天的我們呢？」驚天，我回憶起某次在侯仁之家中的一幕：學校總務處的辦事員幫他買來一把掃地的竹掃把，侯老再三稱謝不已。因他幾十年間黎明即起，第一件事就是用的竹掃把清除落葉。侯老上年紀後，則由總務處代買，然後由校工代送到家。這一次校工剛告辭出門，侯老急忙追出：「如果明天咱們對面相遇……而我又不能與您打招呼的話，沒有其他原因，只是我雙眼近乎失明……」如今，如今的北大只剩下這一位侯老。

新政協會議中的新聞界代表

王鵬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日至三十一日，在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史稱「舊政協」，而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北平（自九月二十七日起，北平改稱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則稱「新政協」。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及九月十七日在北平召開的新政協籌備會議的兩次會議上，確定了新政協組成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分配原則和產生辦法。新政協會議由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和特別邀請人士等五個方面組成（含四十五個單位），正式代表為五百一十人，候補代表（只有發言權，沒有表決權）為七十七人，特別邀請人士為七十五人。

新聞界代表
在新政協會議中，新聞界的代表是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為單位，其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補代表二人。他們是：正式代表胡喬木（新華社社長）、金仲華（上海《新聞日報》社長）、陳克寒（新華社副總編輯）、張磐石（《人民日報》社長）、鄧拓（《人民日報》總編輯）、憚逸群（上海《解放日報》社長）、楊剛（女，上海《大公報》副總編輯）、邵宗漢（香港《華商報》副總編輯）、徐邁進（中央廣播事業管委會辦公室主任）、劉尊棋（香港《遠東公報》主編）、王芸生（上海《大



一九四九年，新政協會議上的新聞界代表合影：第一排右起王芸生、金仲華、胡喬木、楊剛、鄧拓；第二排右起趙超構、邵宗漢、憚逸群、徐邁進、徐鑄成；第三排右起儲安平、陳克寒、劉尊棋、張磐石

自由的。」在那些暗無天日的歲月裡，她們不能出門，不能大聲說話，廁所要盡量少用，晚上不能點燈。安妮覺得自己快老了，嚮往著能騎車、跳舞、吹口哨的自由生活，把自己的一絲一毫感受都寫進了日記。幸虧有他父親的幾名傭員給他們偷偷送食物和書報，他們才得以在這種裡生存了兩年多。可最後卻還是被人告密，被納粹抓進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們八人中有的死於毒氣室，安妮母親病死，安妮自己及其姐姐傷重而死。安妮父親奧托·弗蘭克則逃過劫，設法出版了女兒的日記《安妮日記》。自一九四七年問世後，已被譯成六十五種文字。
一九四五年安妮死時才十五歲，若能活到今天，也才八十歲。一個年輕的生命早早地消失了，但她的日記使她永生，令世人永遠緬懷她。而那個至今未被查出的告密者，即使能活到今天，也一定是一個始終生活在無窮恐懼和恥辱之中的卑怯可憐蟲。

遙看「開國老書刊」

紀昱
為了紀念「開國盛典」，當時由籌備組織部門製成具有權威性的只有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一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刊》（一九四九年「建國」十年大慶時，被人民出版社原裝重版）。而「最早的原始態」，卻是另外一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刊》。由會議新聞處編輯出版，從開幕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到閉幕的十月一日每天出一期，到十月十日出版了最後的第十二期，雖然內容與裝幀很不精美，但是有歷史意義的時效。
譬如，一直有誤解劉少奇參加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禮，其實《新政協會刊》面記載得很清楚：「第八天大會的經過」：「本屆會議的執行主席劉少奇、李立三、沙千里、梁希、盛不華擔任選舉總監督，明徹、李立三、沙千里、黃昏、部分代表去天安門廣場奠基，還須趕回會場繼續未完的會議，所以整個用時也不長；而且奠基禮的幾張照片中，並沒有劉少奇，可見劉少奇當時是留在會場主持監、檢

加了書名號，是文章還是書？《北大十教授》是一年前，上海《新民晚報》副刊部主任，關係我妻子寫的。她當時在民盟中央的《群言》雜誌當編輯，因工作關係與北大的教授們有些來往。知道了這背景，主任問：你提筆就能寫的，應該有幾個了？妻子屈指數道：有五六位吧。主任說：補充採訪一下，短文字我們《十日談》連載吧。
終於，這十篇一千二百字的短文發了出來。這十位教授分別是：吳組湘、季羨林、李鎮西、金克木、聞家驊、鄧廣銘、張岱年、陳岱孫、侯仁之、馮友蘭。您熟悉其中哪幾位？他們是教什麼學問的大學者？您知道他們哪些小故事？關於他們的排名，誰先誰後有什麼考慮？其中把馮友蘭放在最後，難道僅僅是因為他的年紀最大？他們目前有何處世？只剩下位侯仁之，他住進北大的校醫院也超過半年了……
當年妻子採訪，我陪過幾次，因為有幾位與我父母很熟。我當時正熱衷研究京戲，對高校長物興趣不大，但我有一種特殊感覺：十教授又可以組成一個特殊的長廊，裡邊生且淨且重唱念做打，與梨園風氣又不同。他們可以與你談學問，也可以說些家長里短，但讓你感到這通篇是一部大寫的書，是一種絲毫毫不輸於戲的大學問。北大的十教授，這應該說是一個很典型又很難得的教授群。陣容整齊，卻又分門別派。事實上，北大在其不同的歷史時期，這樣的教授群並不少見。研究其成因，又不能不探討蔡元培校長治校方針。蔡元培只活了一輩子，但他的教育方針卻影響了幾代人。今天大學教育縱有千百種成績，唯獨讓其拿出一個實力均衡的十教授名單，恐怕會感到很難。
還不能不注意到季羨林在上一屆十教授中排名「老二」。在那時的大名單中，顯然是沒有王將或盟主的，但季羨林毫不介意，反正自己的桌燈在沒有開過，最早，反正住住房開關的「季羨林圖書館」不是徒有虛名，反正自己堅持並延續的是老山東人的特性；此時他還沒有花費時間與精力去寫純文學的散文，也還沒有對人類文化問題做出過精彩的預測。總之，此時的季羨林更像七十歲前的種種。季先生對我是有偏愛的，接受過我的請教，合適的，還給我的書寫過序。但十教授最後的季先生是在孤軍奮鬥，我總覺得最後的季先生是那樣的日子。他心中有寂寞與淒涼，他只能不停地寫。
還有一點，妻子寫《北大十教授》時，被訪者多超過了八十歲。大部分人不教課了，都在做個人或學問的文化梳理；當時北大領導層很少干預諸老，諸老也由衷高興：讓我們自由就好！他們年輕時是很抓緊的，不抓緊出不了成績；此際進入了晚年，他們則願活得更隨意些，能夠在池塘邊上漫步，坐在長椅上想點什麼，就已經很愜意了。那時的朗潤園，只有池中的幾聲風荷，還沒有今天的高樓風起。那時是適合做學問的呀，那時也更安靜與舒適呀，但此語剛出口又急忙囑咐不要寫進文章……今日大學有超過當年的千百種實績，但很難再拿出一份這樣的大名單。事實證明，文化上要尊老，老人與老的文化還都是有用的。
時光在回憶中流逝。我們夫婦原來來的十之五六，寫完了文章，依然並繼續熟悉的，還是那十之五六。北大校園中的朗潤園與燕南園在內的幾個局部，其中涉及到十教授的風景與人文，都深深烙印進我們的腦海，他們就如我的父執，能夠不時入夢，有意或無心引導我繼續前行。我也有夢醒之時，閉眼一然他們的呼喚，大多灰灰塵塵，很難難進當世，向學界大聲的疾呼。然而，十教授還是十教授，儘管他們也會年輕過，但總不像後來來學界對他們高聲仰視並遠遠隔離着的那樣。
「如果我們當初對前輩，也總像你們今天對待我們一樣——高聲仰視又遠遠隔離，哪樣還能成就出今天的我們呢？」驚天，我回憶起某次在侯仁之家中的一幕：學校總務處的辦事員幫他買來一把掃地的竹掃把，侯老再三稱謝不已。因他幾十年間黎明即起，第一件事就是用的竹掃把清除落葉。侯老上年紀後，則由總務處代買，然後由校工代送到家。這一次校工剛告辭出門，侯老急忙追出：「如果明天咱們對面相遇……而我又不能與您打招呼的話，沒有其他原因，只是我雙眼近乎失明……」如今，如今的北大只剩下這一位侯老。

因為我對人民政協組織法曾經提過意見，所以特別邀我參加，以便使我發表意見。這樣周密的協商，使我感觸極深。」

新政協會議是昔日中共召開的最重要、最大規模的會議，會議組織工作繁雜，秘書工作人手缺乏，因此許多代表兼任了秘書工作。如新聞界代表楊剛兼任「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的秘書，劉尊棋代表兼任「宣言起草委員會」的秘書。他們要付出比其他代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發揮更多的智慧。

新政協會議開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時半，新聞界代表集合，前往中南海懷仁堂赴會。下午七時，新政協籌備會副主任周恩來報告代表名額和到會代表人數，然後提出大會主席團人選名單草案，大會一致通過。下午七時四十分，毛澤東主席宣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這時，樂聲大作，場外鳴禮炮五十四響，全體代表起立，長時間熱烈鼓掌。

在毛澤東主席致開幕詞後，全體代表為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致哀三分鐘，接着有十二位代表上台發言。金仲華代表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記錄下這些代表的發言時間：劉少奇（十四分鐘）、宋慶齡（十二分鐘）、何香凝（十五分鐘）、張綱（十一分鐘）、高尚（十八分鐘）、陳毅（五分鐘）、黃炎培（十一分鐘）、李立三（十六分鐘）、賽福鼎（連同翻譯十六分鐘）、張治中（十分鐘）、程潛（九分鐘）、司徒美堂（連同翻譯十三分鐘）。這一開幕的盛況，新聞界代表紛紛拿起手中的筆記錄下來，發表在各自的媒體上。

大會發言

在大會召開期間，各個組成單位都要推舉首席代表，在大會上發言。新聞界十四位代表和候補代表對這一發言十分重視，一致決定推舉胡喬木為首席代表，並幾次開會研究發言內容。憚逸群代表提出應以「宣傳」會議即將通過的文件和今後更好地履行「監督」各級政府的職責為中心，闡述新聞界的觀點，得到了大家的擁護。在九月二十三日下午的全體會議上，胡喬木代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作大會發言。他說：「在全體會議通過這三個文件以後，我們新聞界同人決定努力用實際行動來加以擁護。我們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宣傳，我們要三個文件的意義和整個人民政協的意義向全國人民作反覆的廣泛的宣傳，號召全國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為實現共同綱領和人民政協的一切決議而奮鬥。再一個是監督，我們要用人民輿論的力量，協助人民監察機構，來監督各級政府和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是否忠實地執行共同綱領和人民政協的一切決議。」在談到新聞界關心的言論自由時，他繼續說：「我們新聞界同人對於共同綱領列有新聞工作的專條和中央人民政府設有新聞總署這兩點，感到極大的鼓舞。共同綱領第四十九條規定保護報道真實新聞的自由，我們認為十分重要。在國民黨統治下，我們不能報道真理。在宣傳虛偽的所謂新聞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報紙、雜誌和廣播用不真實的和有害於人民的新聞，蔽塞人民的耳目，毒害人民的思想。反對這樣做的新聞工作者就受到迫害。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新聞工作者傳布真理的自由才能受到政府和物質的保障。」

（上）

吃西餐的感覺

魯人
兒子吃牛奶、麵包比我的鹽多，對西餐便有種水到渠成的偏好，從麥當勞、肯德雞之類的西式快餐，到法式豬排、罐頭牛肉之類的正宗西餐，一律視為美味。妻子祖上家境不錯，她也承受了些餘蔭，對西餐也頗偏好，雖算不上美食家，倒也能說出個一二。我小時候在農村喝了十來年的棒碴子粥。回到家裡，家裡生活雖不拮据，可父親以上玉米麵吃得多，沒有承受西餐的胃口，而且潛意識裡西餐是資產階級奢靡的象徵，我自然也就沒有機會走進那充滿異國情調的西餐廳。
婚後，我與妻子將兩家的飲食習慣帶來，糅和在一起。她吃排骨包子，一頓七八個；我對牛排、沙拉也慢慢接受了。漸漸，還學着做起來，雖有些東施效顰，卻是自我感覺不錯；又漸漸也真得到了一些朋友的首肯。家中來客，端上最拿手的牛排和紅菜湯，竟使他們胃口大開，臨走抹抹嘴，擱下幾句由衷的稱讚。
麥當勞、肯德雞春苗般湧現於城市時，兒子沒眨眼就接受了，如今的孩子雖多早慧，兒子吃巨無霸、麥樂雞，喝可樂、檸檬茶卻不是為了虛榮，也不為顯示自己新潮、「酷」，而純粹是為了解饞。以至幾歲時，便自己做漢堡包當早點，將買來的漢堡包一切兩開，夾上幾片火腿腸、黃瓜或生菜，抹上黃油，撒上海鹽，吃得一臉快哉！讓我這做老爸的覺得不可思議，總覺得那東西偶吃之尚可，常了總比不上果子、煎餅、鍋巴。偶然吃了一次西餐，兒子立刻對西餐也鍾情起來。一次在一家百年西餐老店，兒子舞刀弄斧，切下一塊法式牛排塞進嘴裡大叫好吃；妻子嘗了一塊也說不錯；唯我覺得像拍扁了的牛肉丸子，味道絕對比不上我自己的家常牛排。紅菜湯，用舌頭咂咂滋味，還是不如我自己的手藝。
我吃西餐的樣子也很惡俗，既不懂使用刀叉的規矩，也沒什麼興趣去弄懂，只是隨心所欲地揮舞着，讓行家暗笑我很老土。不感冒西餐，還因為其價奇貴，一份法式牛排只那麼兩塊，一份德式青豆湯，更不過綠豔豔而無味的一小盅，一頓西餐是兩頓中餐的價。只從用料來看，西餐比中餐純屬屬實，價格不全是一個「西」字。
妻子吃西餐總有點懷舊的味道，常把如今的罐頭牛肉與小時的相比。我在家時覺得自己已經接受了西餐，結果，對正宗的西餐卻頗不以為然，才知道自己喜歡的按自己的口味改良的西餐，骨子裡仍是中餐的精髓。兒子吃起西餐津津有味，對西餐津津樂道，讓我時常困惑，有時都想給他上網。線。